

责任编辑 尚佐文

封面设计 刘 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小说史/欧阳健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3. 3

(中国小说史丛书)

ISBN 7—80518—783—5

I. 历... II. 欧... III. 历史小说—小说史—中国
IV. I207. 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988 号

历史小说史 欧阳健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20 千 印数 0001—21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18-783-5/I·730 定 价: 22.50 元

“中国小说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主编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编委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独一无二的历史小说系列	1
第二节 历史和小说：从“同源同体”到 “同源异体”	3
第三节 历史小说的文体特征	12
第四节 中国历史小说史的演进节律	25
第一章 宋元时期的讲史	30
第一节 讲史的先声——唐代的转变和说话	30
第二节 宋元讲史的盛况	33
第三节 市井艺人另造的历史世界	43
第四节 宋元讲史的多元艺术取向	56
第二章 罗贯中——演义文体的奠基者	67
第一节 罗贯中的生平经历	67
第二节 演义文体的典范——《三国志演义》	78
第三节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别样意趣	93
第四节 统一王朝的全史演义—— 《隋唐两朝志传》	104
第三章 明代的历史小说与本朝小说	126
第一节 非“明代前期空白论”	126

第二节	历史小说宏伟系列的构建·····	140
第三节	两种旨趣的比试与较量·····	153
第四节	明代的本朝小说·····	199
第四章	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	224
第一节	明季时局与时事小说·····	224
第二节	时事小说系列之一——魏阉小说·····	228
第三节	时事小说系列之二——剿闯小说·····	251
第四节	时事小说系列之三——辽事小说·····	266
第五章	清代的历史小说及其他·····	305
第一节	四大演义定本的形成·····	305
第二节	历史说部的世俗化·····	338
第三节	杜纲对历史小说史的贡献·····	355
第四节	清代后期的本朝小说与时事小说·····	370
第六章	晚清的历史小说及其他·····	382
第一节	“历史小说”理论的形成·····	382
第二节	吴趼人的历史小说·····	395
第三节	黄小配的近代小说与历史小说·····	409
后记	·····	438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七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欧阳健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殿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三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

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阿英、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2002年12月

绪 论

第一节 独一无二的历史小说系列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是本有新意的学术著作，第四章“历史小说：史传传统与史诗模式”，则是比较中西历史小说的专章。作者引西方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话：“我用的方法是把我的叙述力量全部集中于人物和人物的热情上——这些热情是社会各个时期人们所共有的；这些感情同样地激动人类的心，不论这颗心是在 15 世纪的钢铁盔甲下，在 18 世纪的织锦外衣下，还是在今天的蓝色礼服和白斜纹布背心下跳动。”又引另一位西方历史小说家大仲马的话：“历史是什么？是我挂小说的钉子。”得出了如下结论：“出于这样一种创作意识，西方的作家就不像中国的演史家那样尊重历史的自然，而对历史事变的处理带着一定的随意性，甚至用自己的想像去取代一部分历史事实。”^①

那么，西方历史小说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创作意识”呢？作者的答案似乎是归结为西方的“个人英雄史观”。其实，根子恐怕更在西方没有中国人的“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观念，没有中国为记载国运兴衰、褒贬人物功过的以“二十四史”为主干的史书系列。令西方人自豪的古希腊“史诗”，原本就是“需要由想像来加以丰富的”（伏尔泰语）、“比较能容纳不近情理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jiong.com

事”（亚里士多德语）的“传奇故事”（黑格尔语）。传统如此，观念如此，又何必为小说家“随意歪曲”历史感到惊诧呢？

号称西方“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1771—1832），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利》发表于1814年，相当于中国清代嘉庆十九年；他最成功的历史小说《艾凡赫》发表于1819年，相当于清代嘉庆二十四年。仿效司各特成名的大仲马（1802—1870），他的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于1844年问世，相当于清代道光二十四年。而中国宋元（960—1368）时期的瓦舍勾栏，早有了“讲史”的家数；自罗贯中于明代洪武四年（1371）写成《三国志演义》，至杜纲于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撰就《南史演义》，与正史相表里的历史小说系列便已宣告完成。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说得好：“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存古之功”的中国历史小说系列之最后奠定，比西方“历史小说之父”的第一部作品问世还早了九年！试问，该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看中国历史小说呢？

要之，历史小说使历史走近了中国读者，又使读者走进了中国历史。它孕育、熏陶了千百年来的无数普通民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节 历史和小说： 从“同源同体”到“同源异体”

中国历代的当政者都十分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的记载和历史的教。这一传统反映在体制上，就是史官的建置。据《周礼》记载，西周就有一批称为“史”的官职，如大史（“大”音泰，后世多写作“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合称“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籍，记文书草之人”^②。“记文书草”，就有记录所见所闻言事的职责。《礼记·玉藻》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关于左史和右史的分工，与《礼记》的说法不同，杜预《春秋传序正义》认为：“左是阳道，故令人记动；右是阴道，故使之记言。”从左右阴阳判定是《汉书》的失误，是有道理的。这些记录当时当地发生言事的典籍，经过整理编纂就成了“历史”。

在不少人的意念里，把“历史”和“小说”的界限区分得非常严格，好像“历史”一定是真实的，而“小说”则与虚构必定有摆脱不了的干系。他们往往把“史实”与“虚构”的差别看得非常绝对，却不大去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互通性。其实，“历史”一词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进程。毫无疑问，一切以往发生的事变都是客观的存在，但对后人来说，却是永远消逝的、不能重现的存在；后人只能通过历史的凭证（包括文字记录）来推知它的大体情况，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在后一意义上，使用“史书”似乎更为妥切。

从根本上讲，广义的历史（即以往人类无比丰富、无比生动

的社会生活),是历史记载和阐释的惟一源泉,也是小说和其它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在严格意义的“正史”问世之前(“史”成为独立部门,始于晋代),历史和小说实际上是共居于一体的。翦伯赞先生说:“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为史。”^③古代人的文字记录,既是地道的“史”,又是地道的“文”。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秦王酒酣,请赵王奏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其后,蔺相如奉盆盎秦王以相逼,秦王不怿,为一击盆,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盆。”秦、赵两国御史当时所记录的,是在顷刻之前刚刚发生、甚至尚在持续之中的外交活动,它固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但未尝不可以将它看作反映现实的小说。历史与小说在发生本源上具有共通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小说与史书之间,又经历了从“同源同体”到“同源异体”的演变过程。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说:“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左史、右史们随时记录的原始芜杂的“当时之简”,虽亦以“史”的面目出现,其中也含有大量的小说因子;由史家“勒成删定”的“后来之笔”,主要的表征就是驱除了其中的小说成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提出了一条“择其言尤雅者”的取舍标准,遂为后世史家所遵循。具体说来就是:1、录真实而弃怪异。如《史记·大宛列传》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刺客列传》云:“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2、录重大而弃微小。《欧阳修集》卷六十

九《与尹师鲁第二书》，谈到他“治旧史”的情况时说：“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于是，原始史料中“细小”和“怪诞”的内容被大量剔除，几乎全被驱赶到“小说”的行列中来了。《史通·杂说》谓梁武帝作《通史》，以为“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敕司徒左长史殷芸编为《小说》。正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所言，“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也。经过史家们如此这般一“编”，《通史》便成为官修的“正史”，而《小说》则以“旧史遗文”的身份退居“外乘”，完成了史书与小说从“同源同体”到“同源异体”的分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与小说各以“正史”、“稗史”的身份，共处于“史”的范围之内，共同担负记载历史与现实的任務。其间虽有崇高与卑微、典雅与鄙俗之分，实际上又处于界限混沌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正史中仍含有小说的因子。乾隆《御制读史汉书有感》云：“两人促膝语，彼此不泄露。所语竟谁传，而史以为据。甚至惟一人，心迹隐未吐。只恐他或知，炳然乃传后。发潜信赖史，纪讹亦屡屡。尽信不如无，不求甚解悟。此皆非常人，卓识有别具。固远不逮迂，翻訾有抵牾。后人复不逮，而更妄非固。呜呼圣贤门，却成是非路。”就是深谙此中奥妙的通家之言。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云：“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则代表了一般读者的见解。另一方面，小说也没有与“虚构”划上等号；“稗史”中记录的事件，有时甚至比正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面。徐渭《〈隋唐演义〉叙》云：“自中古而下，事不尽在正史，而多在稗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5.org

小说家，故乘轩之纪载，青箱之采掇，所谓求野多获者矣。”《隋唐演义》第六十九回回评曰：“从来有正史即有野史，正史传信不传疑，野史传信亦传疑，并轶事亦传之。故耳闻目睹之事，正史所有，人人能道之，不足为异；若耳所未闻、目所未睹之事，人闻之见之，未有不惊骇，谓后人之诬前人也，不知野史中之确有所见、确有所闻之轶事也。”下面且以叙两汉史事之小说为例，对这一“事不尽在正史”论，略加阐述：

1. 《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一名《汉武帝故事》。此书之名首见于晋葛洪《西京杂记》跋：“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三辅黄图》已征引此书，谓为班固撰。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著有《汉书》。《汉武故事》今本有“至今上元延中”语，元延（前12—前10）为汉成帝年号，书中既称“今上”，则当写于成帝之时。又有论者据书中“汉有六七之厄”及“代汉者，当涂高也”之讖语，推定为汉末建安时期（196—219）之作^④。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王俭，字仲贤，南朝宋明帝时人。或其事原有所本，后为班固、王俭辈编纂成书。此书记的是武帝自生漪兰殿至死葬茂陵的琐闻轶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如《颜驷为郎》篇叙武帝尝辇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通过颜驷三世不遇的命运，真切地反

映了文帝、景帝、武帝三世不同的用人政策。又如《微行柏谷》：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纳，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穡，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觇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姬出安过客。姬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姬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姬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姬自还内。时天寒，姬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姬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姬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千金，其夫为羽林郎。

此篇写汉武帝微服私访，险些被旅店主人当作“盗”，幸得老姬性敏知机，设计灌醉丈夫而缚之，又热情地款待了武帝。脱险而归的“上”十分感激老姬，但对那要把自己当盗擒拿的逆旅翁，仍得赞扬他的“警惕性”，擢拔为羽林郎。这类富于喜剧性的轶闻，正史自然是不载的。书中所写的东方朔，身份是“谪仙人”，故一改其“弄臣”的性格。当武帝问他“祠”司命之神能不能令益寿时，竟对曰：“皇者寿命悬于天，司命无能为也。”大约是受方士的欺骗太多，汉武帝也终于有所醒悟，自责道：“朕即位以来，天下愁苦，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

费耗天下者，罢之。”这些事情，也是正史所不载的。

2. 《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内传》一名《汉武内传》，题班固撰，或云东晋葛洪撰。此书乃增饰《汉武故事》会西王母诸事而成，重点在武帝之好神仙之道。透过复杂迂曲的道家术语，可以见出对帝王的批判锋芒。如占者姚翁虽说武帝是“攘夷狄而获嘉瑞”的“刘宗盛主”，同时又说他是“大妖”，指出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将种下未来的危机。西王母、上元夫人更以仙家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平民不敢冒犯的皇帝进行训斥。汉武帝纵然得到西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却没能成仙得道，原因是：“恃此不修正德，更兴起台馆，劳敝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以致天火焚烧柏梁台，长生之事，竟成泡影。

3. 《西京杂记》

据葛洪《〈西京杂记〉跋》云，刘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班固作《汉书》，“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内中有所为班固所不取的，“不过二万许言”，葛洪将其抄出，“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葛洪的话，后世学者如明代黄省曾、清代卢文弨多信之，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力辩其非。《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云：“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存妄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书既名“杂记”，故首尾参错，前后倒乱，但仍有许多真实有趣的轶事。如汉高祖先入咸阳之情形，《史记·高祖本纪》所载极为简略：“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资治通鉴》卷九则稍详：“沛公见秦宫室，帷

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而《西京杂记·咸阳宫异物》则从“异物”的角度作了细致描写：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盈焉。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彩，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熒之乐。”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瑄。”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史记》是史书，“史尚简严”，故只能举其大者；《西京杂记》是小说，却可以铺陈词藻，详加描述，并借“异物”来烘托汉高祖的内心世界。不过，当统治地位一旦稳固，汉高祖也不免要大兴土木。《萧何营未央宫》一篇，记汉高帝七年（前200）相

国萧何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阙凡九十五”。其规模虽不能与阿房宫之“恢三百馀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相颉颃，要亦气势阔大，奢靡不凡。尤令人发噱的是，《作新丰移旧社》记汉高祖为取悦“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的乃父，“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颇洋溢着农家生活的情趣。

《西京杂记》还记叙了文帝、武帝、昭帝、元帝、成帝的许多轶闻。如《方朔设奇救乳母》言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东方朔在侧以言激之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耶？”武帝怆然，遂舍之。又如《画工弃市》云：“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亦肖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这是王昭君故事的较早形态，尚未将画工敲定为毛延寿一人。明人黄省曾序《西京杂记》，说它有四大缺点，即：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所谓“触忌”，指的是赵飞燕与侍郎庆安世淫乱的事，按史书“为尊者讳”的体例，是应该为之隐讳的；《西京杂记》直书无忌，较有揭露黑暗现实的精神。

4. 《飞燕外传》

《飞燕外传》又作《赵飞燕外传》《赵后别传》，旧题伶玄撰。伶玄，字子于，潞水（今山西长治）人。《自叙》谓“学无不通，知音善属文，简率而真朴，无所矜式，扬雄独知之。然雄贪名矫激，子于谢不与交，雄深相毁之。子于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哀帝时，买妾樊通德，乃樊贲之弟子不周之子，能言赵飞燕姊弟事，遂据以撰之。或谓系后人之伪托，亦无过硬的证据。明人胡应麟将其推崇为“传奇之首”，与《杨太真外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以为“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飞燕外传》颇注重宫闱秘闻，如写汉成帝既宠幸飞燕，又闻其女弟合德“美容体，性醇粹不可言”，命以百宝凤毛玉辇迎之，“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且谓：“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帝求白云仙乡也。”叙汉成帝之荒淫昏庸，较雄心勃勃之汉武帝，已不可同日而语。从历史角度看，汉成帝之宠幸宦官，导致王莽篡汉为新，可谓汉家之罪人。小说虽引淖夫人“此祸水也，灭火必矣”之言，将责任推到飞燕、合德身上，但形象的力量表明，熄灭“炎刘”之火的，正是刘氏皇帝自身。

然而，不管史书与小说之间有多大程度的交叉和重合，它们之间的各立门户，却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史书与小说从“同源同体”到“同源异体”的离异，导致了两个最直接最现实的结果：1. 驱除了小说因子的史书，虽然显出了它的庄重和神圣，但同时也变得缺少“文学趣味”；2. 脱离了史书的统系，小说也难免显得散杂与零碎。黄省曾批评《西京杂记》的几条，“触忌须讳”属封建偏见，“猥琐可略”指的是小说的“细小”，“杳昧难凭”指的是小说的“怪诞”，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缺点；惟独“闲